

作为东北文化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平底筒形罐始终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器的主流，赵宝沟文化自然也不例外，这是区域内诸文化共有的特征。在赵宝沟文化陶器群中，最具个性的器类无疑是尊形器。这类器物不但制作考究，形制复杂，而且器表多装饰精美怪异的灵物图案，因而格外引人注目。关于其所蕴含的思想文化内涵，郭大顺先生等早已给出了精妙的解读，此不赘述。在已有研究成果基础之上，本文对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排序及其在后续文化中的传承情况谈些补充性认识，梳理其与中原地区陶尊形器的联系，并就相关问题略陈己见。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的承袭与演变

由于目前所公布的赵宝沟文化材料无一例可兹分期的有效层位关系，使得学界对于赵宝沟文化的分期问题至今未能取得共识性的意见。尽管如此，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发展演变序列还是有迹可循的。

唐山市迁西县西寨遗址位于滦河中游北岸，包含有两个时期的新石器时代遗存，第二期遗存主要出自遗址的第②层堆积中。持西寨遗址第二期遗存属赵宝沟文化观点的学者一般都认为，这批遗存处于赵宝沟文化早期阶段。原因很简单，第②层出土陶器无论是器型还是纹饰都带有明显的兴隆洼文化晚期遗风，在文化面貌上衔接较为紧密，说明彼此间年代相去不远。这就为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排序确立了一个基点。西寨遗址第②层出土两件陶尊形器，均为敛口，且圈足较高（图1-1），这些特征当是陶尊形器的早期风格。

赤峰市敖汉旗小山遗址F2出土陶尊形器是此类器物中最为著名的一件，工匠用娴熟且充满想象力的笔法刻画出鹿首、猪首及鸟首至少三种灵物图像，画面栩栩如生，引人入胜。赵宾福先生注意到，小山遗址F2出土筒形罐及体的形制及纹饰特点与红山文化早期同类标本接近，表明F2应处于赵宝沟文化晚期阶段。该房址出土的陶尊形器口部较直，底部较平（图1-3），这些特征当是陶尊形器的晚期样貌。

基于以上所作的分析，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最早和最晚两种极端形式便基本明晰了。

小山遗址F1出土两件陶尊形器，值得注意的是，二者口部均微内敛（F1②:5参见图1-2），形制介于西寨遗址②层和小山遗址F2出土陶尊形器之间，也就是属于二者之间的联结与过渡形态，其年代也当处于二者之间。

于是我们便初步揭示出了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演变规律，即口部由内敛较甚，到微内敛，最终发展为直口，圈足最终演变为凹底，领部折棱渐趋明显。

许多研究者都坚信，小河沿文化的陶尊形器是由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发展而来的。但不可否认的一个问题是，二者之间存在着千余年的时间间隔，所以对于二者之间的共性似乎只能用“隔代遗传”来解释。事实上，处于二者之间的红山文化也制造和使用陶尊形器，只是一直以来未被辨识出来而已。牛河梁遗址第五地点采集到一件陶片（图1-4），发掘报告命名为“东颈罐”。不难发现，其领较直、圆鼓肩的形态特征，与赵宝沟文化晚期小山遗址F2出土陶尊形器十分相似，所以可将其易名为尊形器。有趣的是，该器口部外敞，而这正是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循序演进的必然结果。从小河沿文化时期，陶尊形器口外敞程度更大。可见，牛河梁遗址发现的这件陶尊形器恰好填补了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向小河沿文化嬗变的缺环，使得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的演变脉络更为连续与清晰了。

小河沿文化赤峰市哈啦海沟墓地M39出土的陶尊形器（图1-5），显然是由牛河梁遗址N5采:3那类标本发展而来的。前者饰彩绘几何纹，无论是整体造型，还是彩绘技法、纹饰风格，都为青铜时代早期的夏家店下层文化所继承，辽西地区陶尊形器的生命力之顽强由此可见一斑。

将陶尊形器这种特殊的器类置于漫长的历史进程中观察，我们不但能够从一个视角看到辽西地区史前文化发展的连续性，亦能看到这一谱系的文化在有序传承基础上的锐意创新。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的传承与嬗变

辽西地区因陶尊形器发现数量较多，特别是器表装饰独具一格，因而颇受学界关注，当然这主要是就赵宝沟文化而言的。相比而言，中原地区新石

器时代同类陶尊形器出土数量不多且缺乏特色，所以相关讨论较为沉寂。

陕西华县元君庙墓地M411:7这件陶器最初被称为盂，之后墓地的发掘者张忠培先生最早认识到，它应是赵宝沟文化传入半坡文化的尊形器（图2-1）。这是颇具见地的卓识，说明早在仰韶时代早期，中原地区就已经与辽西地区建立起了远距离的文化联系。元君庙墓地出土的陶尊形器口较直，由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演变趋势推知，它当是在赵宝沟文化晚期阶段传入关中一带的。其通体素面的特征似乎暗示着，半坡文化居民只接受了赵宝沟文化的这种陶器造型理念，而未吸纳繁缛抽象的神灵图案及其所承载的精神文化内涵。

认真研读河南三门峡市庙底沟遗址的两部发掘报告后我们意识到，这种带有显著赵宝沟文化特征的陶尊形器在半坡文化之后并未于中原地区消失，而是贯穿仰韶时代顽强地延续下来了，甚至在演化路径上也与辽西地区陶尊形器呈现出了一些相似的特征，这的确是极富趣味且耐人寻味的现象。

庙底沟遗址1956年至1957年的发掘在H15内出土了一件“长颈罐”（图2-2），该器为细泥红陶，并且与细泥红陶曲腹盆共出，文化性质属庙底沟文化无疑。其形态与前述元君庙墓地M411:7相似，称之尊形器当是可行的，不过其口微敞，领部较高且施刻划纹。这些共性差异，正是二者存在继承关系并且在发展的过程中有所变化的证明。

庙底沟遗址2002年至2003年的发掘于H212中发现了一件尊形器（图2-3），形态及纹饰与此前出土的H15:77相比几乎完全相同。H212:5系夹砂灰陶，并且与喇叭口尖底瓶共存，显然属西王村文化（也称西王村三期文化）遗物。从造型及装饰两方面来看，西王村文化H212:50当是由庙底沟文化H15:77演变而来的，历时性的变化主要表现为口外敞程度变大。

可见，在中原地区半坡文化、庙底沟文化、西王村文化这一谱系的考古学文化中，陶尊形器的发现数量虽然不多，但也存在着一脉相承的内在联系，这是以往的研究常常忽略的问题。更为重要的是，该谱系文化陶尊形器所呈现出的由直口到微口的渐变趋势，竟与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陶尊形器的发展规律相一致，这种同向性的成因着实引人深思。

余论

在辽西地区，陶尊形器是赵宝沟文化的新创，不过这种新增加的器类并非无本之木。以西寨遗址第一期为代表的兴隆洼文化晚期阶段出现了圈足碗（图3-1），将赵宝沟文化早期西寨遗址二期T23②:3陶尊形器解析开来就会发现，其下半部分的几何图形就是圈足碗。由此推测，赵宝沟文化的陶尊形器就是在兴隆洼文化圈足碗的基础之上，口部向上、向内延长而衍生出来的，生动诠释了同一谱系文化的继承与创新。在后续的发展过程中，圈足的特征逐渐淡化了，最终演化为略内凹的平底。此外，兴隆洼文化晚期西寨遗址T17③:11筒形罐（图3-2）所饰菱形几何纹也在陶尊形器上延续了下来，并迅速发展为赵宝沟文化的标志性纹饰之一。于是，赵宝沟文化陶尊形器的来源问题也就初步解决了。

兴隆洼文化时期的圈足碗显然是日常生活用具，赵宝沟文化早期以此为母体创生出来的尊形器很可能已具有礼仪性的色彩，特别是到了赵宝沟文化晚期阶段，各类神灵纹的修饰使得陶尊形器的非实用性特征更为明显了。然而到了红山文化阶段，由于无底筒形陶器及“塔”形器等陶质祭器的大量涌现，陶尊形器随即被淹没在时代的洪流之中，不但数量骤减，而且装饰简化。到了小河沿文化时期，由于上述红山文化极富特色的陶质祭器未能流传下来，陶尊形器得以奇迹般地快速复兴，数量增加，且多为精心装饰的彩陶或彩绘陶，它们应当在当时的仪式活动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以上所述大体就是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的生命史与功能史，由此我们可以管窥辽西地区新石器文化演进的一个侧面，并揭示西辽河与黄河之间的历史文化联系。

【本文为国家文物局全国考古人才振兴计划“国际比较视野下的中国北方史前文化与社会发展研究”（编号：2024-265）和教育部哲学社会科学 research 重大专项项目“边疆考古与中华早期文明研究”（编号：2022JZD2024）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林大学考古学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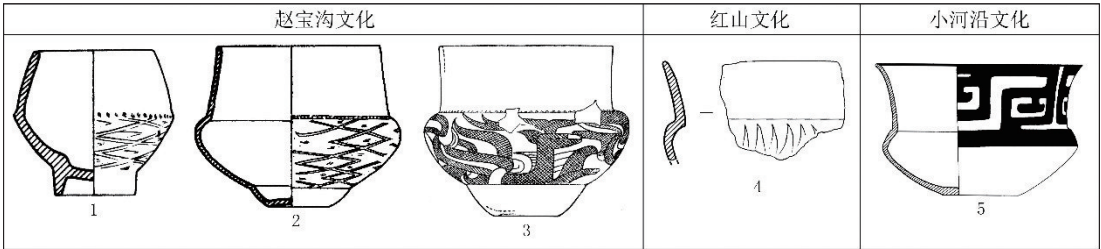


图1 辽西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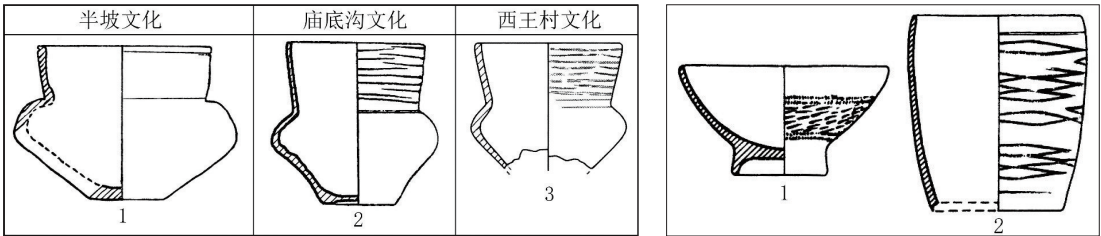


图2 中原地区新石器时代陶尊形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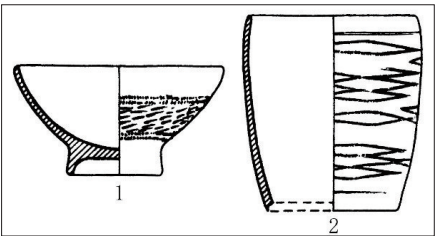


图3 西寨遗址兴隆洼文化晚期圈足碗及筒形罐

考古

旧欢新宠：“新石器研究”的态势

贺存定

石器时代是以石器为主要文化标识的社会发展阶段，可区分旧石器时代和新石器时代。旧石器考古主要围绕石器开展研究，石器的内涵和价值得到充分挖掘，其研究地位不可替代。新石器时代陶器等新的研究对象不断涌现，石器被忽略和冷落，研究地位陡然下降，但石器所蕴含的信息及其价值并未因时代变化而减少。随着考古学研究重心由“器物与谱系”向“人与社会”的转移，新石器时代的石器研究（简称“新石器研究”）潜力逐步释放，以往“喜新厌旧”的态度并不可取，“旧欢新宠”融合并存在或此消彼长应是未来主要趋势。

现状剖析：“新石器研究”因何被边缘化？

新石器时代考古对遗物的关注存在明显不均衡，石器研究虽不可或缺，却常处于被轻视或边缘化的境地。这种局面的形成往往是学术的传统惯性、研究的目标导向、认知的价值偏见、学科的人为割裂等多重因素交织影响的结果。

文化谱系研究的传统惯性

新石器时代以磨制石器为主要特征并以此命名，但研究者对陶器这种新事物的偏爱明显，石器这种旧事物则被轻视。对陶器的偏爱很大程度上由陶器本身的特点和考古学研究的传统所决定。当新石器考古的核心任务被设定为“文化谱系构建”时，陶器自然成为研究者的新宠，而石器的跨时空文化指示性相对较弱，被边缘化也在情理之中。

文明起源探索的重心导向

农业与文明起源是新石器考古研究的核心任务。“新石器研究”作为基础性研究，贡献于农业与文明起源等宏大叙事的能力受到质疑，其研究空间被严重挤压。文明起源形成的研究更聚焦于聚落结构、墓葬规格、玉器、陶礼器等文明要素，石器被归为史前“传统技术”的孑遗，因揭示社会复杂性的能力较弱而被忽视。

石器内涵价值的认知偏差

打制石器在新石器时代遗址中不仅普遍存在甚至是主流遗存，在南北方不同时期的考古学文化中广泛分布。部分遗址出土石器数量、类型少，研究者也只关注少量工具而不去思考遗址为什么有工具的使用而无工具的生产。学术界对打制石器的系统报道和研究较少，即便是磨制石器，多数研究也停留在类型学层面，未能深入到加工技术、使用功能和废弃过程的全链条分析。

研究理念方法的学科鸿沟

旧石器考古与新石器考古之间由于学科创始人的专业背景、学术机构建制的分化设立、学术研究范围的人为划分等原因而存在明显的割裂。旧—新石器考古在研究理论与方法、研究范式与理念、研究材料与信息等方面也存在差异，两者各自为政，缺乏频繁的交流对话，形成了不同的学术圈和学者圈。学科的割裂和差异让“新石器研究”处于旧石器与新石器考古、传统与科技考古的夹缝之中，发展缓慢且滞后。

价值深挖：“新石器研究”为何不可或缺？

“新石器研究”绝非单纯的类型与技术考证，而是通过破解石器背后隐含的技术演变、人类行为、社会经济、社会组织、精神世界和文化交流等多维“密码”，为生动立体复原史前人类的适应生存图景和社会发展过程，提供不可或缺的基础实证。

技术演变与社会变革的缩影

石器制作技术是人类思维能力和认知能力的物质投射。打制技术向磨制技术的转变，不是简单的技术进阶而更像是一种技术转向，是古人在应对环境资源和生活方式变化的大势中做出的技术调整和适应。石器类型组合的共时性联系忠实记录了古人类复杂多样的人类行为，而石器类型组合的历时性变化则反映了古人类生产生活方式的转变。如细石器、端刮器、雕刻器等打制石器组合是高频迁徙的狩猎采集工具，表现为动物资源猎取、肢解消费等多样化的行为活动；石斧铤和磨盘磨棒等磨制工具组合则往往与木材砍伐与深加工、植物资源强化利用等行为活动相关，是流动性下降、定居或半定居生活的产物。

研究新石器的技术演化轨迹，可以反映史前人类的技术认知和选择，还能映射从狩猎采集到农业社会的巨大转折。分析新石器的类型组合，可以复原古人类生存场景和定居化程度，还可以了解社会变革的原因和动力。石器是技术转型与科技创新的记录仪，是人类行为与生活方式的解读者的。

生产生活与生产模式的实证

石器是史前最主要的生产生活工具，同时石器又是竹木器、骨角牙器等其他工具之母。砍砸器、刮削器、尖状器等仍是竹木器和骨角牙器的主要加工工具；石片臼、研磨器等碾磨工具既可加工食物也可制作颜料；石斧铤、石凿、石楔等是典型的水工工具组合，可以深加工竹木器具等手工业产品，也是修建木质建筑的必须工具。石铲、石刀、石磨盘等石制农具构成了完整的农业生产链条，是研究农业起源与发展的核心物证。遗址中大量不同加工阶段的工具类型共存，不仅可以揭示石器生产的技术方法和完整工艺过程，还指示了有组织、专业化的石器手工业经济。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中发现细石核、细石叶、石镞等细石器组合，代表着狩猎采集经济形态的延续或残存，而南方新石器时代遗址保有大量旧石器组合，显示渔猎采集经济发达而农业经济并不突出。

通过观察石器在生产生活及经济中发挥的作用，可以实现“透物见人、见社会”的考古学解释。不同类型组合的工具反映了多样化的古人类生产生活行为，复杂多样的工具是古人基于“成本效率”考量的经济决策和设计思维。将石器纳入整个经济生产与社会组织系统，还可以探究经济贸易、聚落形态、文明兴衰等深层次问题。

文化交流与精神世界的折射

石器标记着人类迁徙扩散、文化交流互动的线路与方式。追踪石器原料的产源，可以分析本地原料与外来原料的构成及利用策略，为研究史前资源控制、贸易网络和跨区域文化互动提供证据。石器特征风格与技术传统的跨时空比较研究，可以重建更广阔时空框架下技术适应与文化传播的过程与路径，为我们勾勒出古人迁徙扩散与交流互动的动态图谱。石器往往还被赋予各种精神文化象征意义：精准刻片的细石叶石核、极致减薄的两面器，具有炫技审美与技术传承等非实用意义；石环、石笋、串珠等是典型的装饰与艺术品，而石钺、石璧、石璋等已经证实是权力与礼制的象征；石球、石丸被当作祭品进行埋藏，石斧、石铲工具组合出现在少量特定人群的墓葬、砺石、研磨器与骨角器共存。这些石器类型与组合不仅是特殊精神文化与传统习俗的表征，也具有揭示社会分工与阶层分化的意义。

具有特殊形态和技术特征的石器，往往是区域文化的核心标识，通过观察这种文化标识的时空关联，可以很好地了解史前社会的文化交流互动网络。那些被特殊对待的非实用性石器，是解读史前人群身份性别、社会关系、精神信仰的直接线索，能够走近史前社会的礼仪与精神世界。

路径倡导：“新石器研究”如何复兴强化？

“新石器研究”很早便形成了多学科综合的研究范式，体现出明显的实证倾向、综合的研究手段和广阔的学术视野。这种研究范式和学术传统并未过时，反而与当下考古学研究的发展趋势不谋而合，仍是未来应大力提倡的路径导向。

夯实基础、审视传统，建立“石器等同陶器”的理念意识

全面系统的石器信息采集与发布是开展后续研究的前提和基础。本文倡导的重点在于从理念上将石器等同于陶器来进行信息采集：首先，对出土石器进行全数采集，不仅采集成品工具，更要系统



大溪遗址出土石核和石片

采集石核、石片、断块等副产品，为复原石器操作链奠定基础；其次，准确记录石器的出土单位、位置和伴生关系，为遗址功能分区和人类行为关联分析提供空间依据；再次，对发现现场和资料整理过程中发现的可拼合石器进行识别和记录，有利于重建石器剥片方法及工具加工策略；最后，资料刊布尽可能细化分类，对不同类别的石器除了代表性标本展示之外，尽可能公布类别数量、原料类型、加工技术、尺寸形态等基础观测数据和信息，便于后续深入研究。

石器的类型和形制在时空上变化较小，但这种相对稳定的特性正是古人类生存适应策略趋于最优解的反映，也是技术文化传承延续的表现。这种相对于“变”的“不变”也是非常值得研究的课题，如局部地区石器技术类型不变及农业不起源的原因。同时，在更广阔的时空范围内，石器的类型与技术也并非不变，这种不易变而发生变化背后的动因与机制，更值得思考和研究。

平衡重心、转变导向，构建“从微观到宏观”的分层次研究体系

相对于农业与文明起源等宏观研究来说，“新石器研究”是偏微观的专题研究。微观与宏观研究之间是内容与框架的关系，既要关注框架的完整也要兼顾内容的充实，实现二者的平衡协调。同时，“新石器研究”与陶器研究、动植物研究等都是针对特定类别材料的专题研究，均服务于复原古代社会等宏大目标任务。专题研究与宏大目标之间是部分与整体的关系，需要兼顾整体与部分的和谐统一，各类专题研究需包容互证，不可偏废，否则容易造成盲人摸象的认知错觉。

九层之台，起于垒土。中华文明起源等宏大叙事由一件件石器、一个个遗址、一串串问题所组建。首先可以将单类石器的分析结果与技术的历时性演变串联起来，将代表性遗址的“新石器研究”放置于文化发展序列中考察其演变规律，完成由点及线的串联；然后将相同或不同时期的石器工业进行跨区域对比分析，探讨技术互动与区域差异成因，实现由线到面的交织；最后不满足于“这是什么石器工业”，而要追问古人为何做出这种技术选择，这种技术选择与环境背景、社会经济与“社会信仰”等因素之间有何关联？达成由面成体的重建。显然，分层次的“新石器研究”体系为我们看待宏大叙事提供了一种全方位的视角，同样可以为准确认知“多元一体”的中华文明做出积极贡献。

理念革新、价值纠偏，提倡“静态终端”到“动态流程”的学术转向

传统的“新石器研究”多关注石器的终端类别和形态特征，采用分类学与形态学方法，完成“石器是什么”的认知。这种石器研究者的视角是静态的和局部的。显然，我们需要动态和全景的技术视角，才能更好地达成认知人类技术行为和决策的目的。现代学术研究倡导多视角综合分析和问题意识，除了石器研究者的视角之外，还需要兼顾石器本身和石器制作使用者的视角，完成“石器是什么”到“石器为什么是这样”的学术转向，即不仅要搞清楚石器类型特征是什么，还要搞清楚如何生产以及为何生产这种类型特征的石器。

明确研究问题和目的之后，选择对应的解决方法。我们可以采用操作链分析的理念，将石器生产过程中的成品、半成品、雏形、毛坯等不同加工阶段的工具以及制作工具所用到的石锤和砺石等进行聚类分析，为还原制作石器的加工技术与工艺流程提供材料支撑。我们还可以采用动态类型学与生命史的理念，将石器分为制备类型、制作类型、使用类型、废弃类型等，构建从制备到废弃各个环节的生产组织形态，实现对石器“生命史”的完整复原。在此基础上，我们才能更好地解读石器是如何被加工和使用的，也才能解释为什么有些遗址只有使用和废弃类型石器的现象，进而了解石器主人的行为与故事。

理论融汇、方法整合，弥合“新一旧石器考古”的跨学科鸿沟

石器是串联旧—新石器时代的最主要物证。旧—新石器考古虽然在理论方法和学术传统上长期被人割裂，但二者在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和研究目的等方面并无本质区别。具体到石器研究来说，旧—新石器研究都在开展类型学、技术学和功能学等方面的研究内容，也都采用多学科交叉的研究方法，目的也都是为了揭示史前社会及其发展演变，只是同样的理论方法在运用于不同时代的材料时，会不可避免地遇到适配问题，这仍需要具体材料具体分析。显然，在跨学科交叉融合的大势之下，考古学科内部的新一旧石器考古研究更应充分联动融合。

具体路径如下：一是过渡研究的推进与整合。旧—新石器时代过渡时期是旧—新石器时代考古最容易接轨的领域，加强两个领域的交流协作和协同攻关，共同服务连续史前技术史和文化史的复原。二是理论方法的互鉴与融合。“新石器研究”呈现以文化背景与类型分析为主的传统综合模式，旧石器研究擅长以微痕分析、模拟实验为主的科技实证分析模式，加强两种模式的互鉴与融合，共同提升研究水平与质量。三是人才培养的跨领域训练。人才培养和理念认同仍是跨学科领域融合的关键，课程设置中可以淡化旧—新石器时代的界限，在研究生培养中增加跨领域的技能实操训练和研究交互融通，为跨领域人才的成长打好基础。四是学术共同体的倡导与支持。发起石器时代等主题的书业会议和期刊专栏，为旧—新石器考古研究搭建畅通的学术交流平台。在项目申请中，对旧—新石器跨界融合项目予以倾斜支持，引导和增进彼此的理解与认同。

结语

“新石器研究”长期被忽视，但这并不意味着其学术价值的消减，我们有必要反思和重新审视它的发展潜力。国际学术界已有学者疾呼，石器研究应当作为人类起源和文化发展研究的“基础科学”来重新定位。这一观点在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学的语境中同样适用。石器是理解人类技术认知和行为方式、史前生产经济和社会组织最直接且系统的物质材料，是支撑文明探源、早期国家形成等宏大叙事的基石。从类型特征的终端分析到技术操作链的过程研究，从功能研究的主观推测到微痕分析与模拟实验的考古实证，“新石器研究”拥有一整套日益成熟的方法论工具，可以完成从“以物论物”向“透物见人、见社会、见精神”的转变，足以支撑文化与谱系研究的配角转变为行为与社会考古的主角。推动“新石器研究”的复兴，需要的不仅是技术方法的更新，更是学术传统和理念的转变，让石器不再是“沉默的器物”，而是真正成为“文化的使者”。

（作者单位：西北大学文化遗产学院）